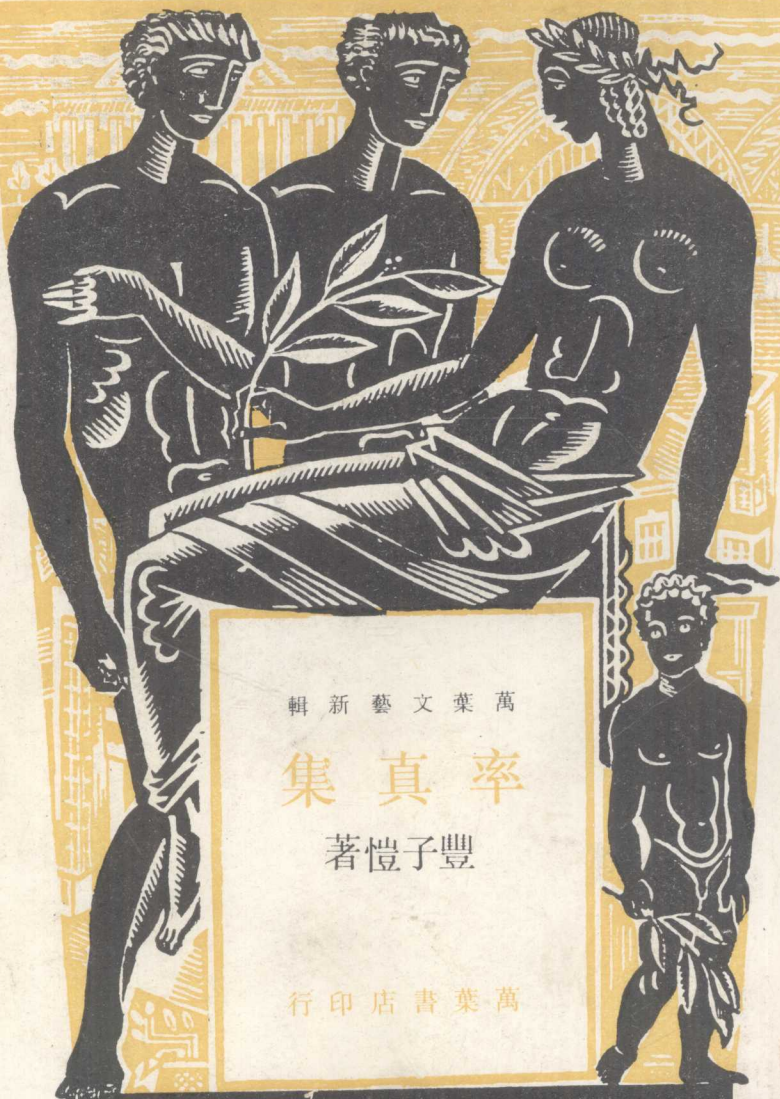


教閱



輯新藝文葉萬

集真率

著愷子豐

行印店書葉萬

萬葉文藝新輯

率真集

豐子愷著

萬葉書店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十日初版

萬葉文藝新編

率真集

(散文)

印	發	主	著
刷	行	編	作
者	者	者	者

萬	錢	錢	豐
葉	君	君	子
書	甸	甸	愷
店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總發行所

萬葉書店

上海天潼路寶慶里三九號

序

與君匋相別八年，音信少通。勝利後忽接來書，知八年間蟄居滬上，一片冰心，寄情金石，並知萬葉書店，又復欣欣向榮。余讀來書，甚爲欣慰。君匋爲萬葉書店索文稿。余八年間轉輾流徙，席不暇暖，加之老病交侵，文筆久疎。檢點行篋，雖積有若干篇，然皆瑣屑閒談，無裨學術；更無關於「大時代」。當此空前勝利，日月重光之際，實無刊印此等文稿之必要也。君匋拳拳情不可卻，姑選定十餘篇與之。此等文稿，雖無足觀，但皆出於率真。故定名爲率真集。蓋利用谷崎潤一郎讀綠綠堂隨筆中之評語也。下卷諸篇，乃十餘年前天馬書店所刊隨筆二十篇中舊作。該店久無消息，該書早已絕版。余於重慶舊書攤上偶得一冊，讀之，覺其中亦有率真之語，爲谷崎潤一郎文中所引證者。私心惜其湮沒，故選取九篇，以殿此書。此序作於重慶客寓，時正候船東歸。

此書出世之時，余必可與君匋相見矣。

三十五年五月六日子愷。

目次

序 一

上卷

「讀緣緣堂隨筆」讀後感 一

讀緣緣堂隨筆（附錄） 六

辭緣緣堂 二

為青年說弘一法師 四

悼可師 四

沙坪小屋的鵝 五

「藝術的逃難」 五

中卷

現代藝術二大流派 五

藝術的展望 五

藝術的園地 五

藝苑的分疆	一八
東西洋的工藝	一九
藝術的眼光	二〇
漫畫創作二十年	二六
藝術與人生	二四
藝術與藝術家	二三
藝術的效果	二六

下卷

喫瓜子	一四
兩場鬧	一五
作父親	一五
給我的孩子們	一五
黃金時代	一六
鄰人	一六
蝌蚪	一七
兩個「？」	一八
漫筆十則	一八

「讀緣緣堂隨筆」讀後感

中學生第六十七期（大約是三十三年中出版的）曾登載一篇讀緣緣堂隨筆，是日本人谷崎潤一郎作，夏丏尊先生翻譯的。當時我避寇居重慶，開明書店把那雜誌寄給我。接著葉聖陶兄從成都來信，屬我寫一篇讀後感。戰爭時期，爲了一個敵國人而談藝術感想，我覺得不調和，終於沒有寫。現在勝利和平已經實現，我多年不寫文章，如今也想「復員」。今天最初開筆，就寫這篇讀後感，用以補應聖陶兄的雅屬。夏先生譯文的序言中說：「余不見子愷，倏逾六載，音訊久疎，相思頗苦……此異國人士之評論，或因余之遙譯，有緣得見，不知作何感想也。」爲答副夏先生的雅望，我更應該寫些感想。記得某批評家說：「文藝創作是有進的，不期然而然的。」我過去寫了許多文章，自己的確沒有知道文章的性狀如何。我祇是愛這麼寫就這麼寫而已。故所謂「有進的」，「不期然而然的」，我覺得確是真話。我看了那篇評文，纔知道世間有人把我看作「中國最像藝術家的藝術家」（吉川幸次郎語），而把我的文章稱爲「藝術家的著作」（谷崎潤一郎語）。我們心自問：他們的話對不對？我究竟是否最像藝術家的藝術家？我的文章究竟是否藝術家的著作？對這一問，我簡直茫然不能作答。因爲「藝術家」三字的定義，不是簡單的，古來各人各說，沒有一定；且也沒有一個最正確的定義。

而我的爲人與爲文，真如前文所說，完全是盲進的，不期然而然的。所以我不敢貿然接受他們這定評。我看，「藝術家」這頂高帽子，請勿套到我頭上來，還是移贈給你們的夏目漱石，竹久夢二，或內田百川諸君，看他們接受不接受。我是決不敢接受的啊。

吉川和谷崎二君對我的習性的批評，我到覺得可以接受，而且可以讓我自已來補充表白一番。吉川君說我「真率」，「對於萬物有豐富的愛」。谷崎君說我愛寫「沒有甚麼實用的，不深奧的，瑣屑的，輕微的事物」。又說我是「非常歡喜孩子的人」。難得這兩位異國知己！他們好像神奇算命先生，從文字裏頭，把我的習性都推算出來。真可謂「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了！讓我先來自白一下：我自己明明覺得，我是一個二重人格的人。一方面是一個已近知命之年的，三男四女俱已長大的，虛偽的，冷酷的，實利的老人（我敢說，凡成人，沒有一個不虛偽，冷酷，實利）；另一方面又是一個天真的，熱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這兩種人格，常常在我心中交戰。雖然有時或勝或敗，或起或伏，但總歸是勢均力敵，不相上下，始終在我心中對峙著。爲了這兩者的侵略與抗戰，我精神上受了不少的苦痛。舉最近的事例作證：

我最近到一個中學校去訪問朋友，被那校長得知了，便拉了教務主任，二人恭敬地走來招呼我，請我講演。講演我是最怕的。無端的對不相識的大衆講一大篇不必要的話，我認爲是最不自然，最滑稽的一種把戲，我很想同小孩子一樣，乾脆的說一聲「我不高興」，或是罵他們幾句，然後拂袖而起。

一縷煙逃走了。但在這時候，心中的兩國，猛烈地交戰起來。不知怎的，結果卻是侵略國戰勝了抗戰國。我不得不不在校長教務主任的「請請」聲中，搖搖擺擺地神氣活現地踱上講臺去演那叫做「講演」的滑稽劇。上臺後，我頗想乾脆地說：我不高興對你們講話，你們也未見得個個高興聽我講話。你們要我看，看了看，讓我回去罷！但又不知怎的，我居然打起了南方官腔，像煞有介事地在說：「今天承蒙貴校校長先生的好意，邀我來此講演。我有機會與諸位青年相見，覺得很是欣幸……」其實，我覺得很是不幸，我恨殺那校長先生！

我胡亂講了半小時的關於藝術修養的空話，鞠躬下臺，抽一口氣，連忙走出講堂。不料出門來，忽被一批青年所包圍，每人手持紀念冊一本，要求留個紀念。這回我看清楚了周圍幾個青年男女的臉孔。我覺得態度大都很誠懇，很可愛。他們的紀念冊大都很精緻，很美觀。足證這件事是真的，善的，美的。我說：「到休息室來！」於是一大批少年少女跟我來到了休息室。我提起筆，最初在一個少年的網面冊子上寫了「真善美」三個字，他拿著笑嘻嘻的鞠一個躬，一縷煙去了。一雙纖手捧著一本金邊冊子，塞到我的筆底下來。我看看這雙手的所有者，是一個十三四歲的面如滿月的少女。她見我看她，打起四川白笑著說：「先生給我畫！」我心中很想把她的臉孔畫進去。但一看休息室裏擠滿了手持紀念冊的人，而且大都是可愛而可畫的。我此例一開，今天休想回家去！我祇得謊言拒絕，說我今天還有要事，時間來不及，替你寫字罷，就寫了「努力惜春華」五個字，她也歡喜地道謝，拿著走了。我倒反

而覺得拂人之情，不好意思，我原來並無要事，並且高興替一個個青年的冊子上留些紀念。這比空洞的浮誇的「講演」有意思得多，有趣味得多。可是在事實上，種種方面不許可。我祇得講虛偽的話，取冷酷的態度，作實利的打算。寫到後來，手也酸了，時間也到了，祇能在每人的冊子上亂簽「子愷」「二字。許多天真可愛的青年，悻悻然的拿起冊子走了。而且很精緻的冊子上擦草地簽字，實在是暴殄天物，破壞美觀。褻瀆藝術啊！我爲甚麼幹這無聊的事？——以上所說，便是二重人格交戰使我受苦的一個近例。有生以來，這種苦我喫了不少！

吉川和谷崎二君對我的習性的批評，真是確當！我不但如谷崎君所說的「歡喜孩子」，並且自己本身是個孩子——今年四十九歲的孩子。因爲是孩子，所以愛寫「沒有甚麼實用的，不深奧的，瑣屑的，輕微的事物」，所以「對萬物有豐富的愛」，所以「真率」「貴國（對吉川谷崎二君說）已逝世的文藝批評家廚川白村君曾經說過：文藝是苦悶的象徵。文藝好比做夢，現實上的苦悶可在夢境中發洩。這話如果對的，那麼我的文章，正是我的二重人格的苦悶的象徵。而這篇文章，可說是二重人格的苦悶的寫實。

我既承認自己是孩子，同時又覺得吉川谷崎二君也有點孩子氣。連翻譯者的夏先生，索稿子的葉先生，恐也不免有點孩子氣。不然，何以注目我那些孩子氣的文章呢？在中國，我覺得孩子太少了。成人們大都熱中於名利，縈心於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實業問題……沒有注意身邊瑣事，細嚼

人生滋味的餘暇與餘力，即沒有做孩子的資格。孩子們呢，也大都被唱黨歌，讀遺囑，講演，競賽，考試，分數……等弄得像機器人一樣，失卻了孩子原有的真率與趣味。長此以往，中國恐將全是大人而沒有孩子，連嬰孩也都是世故深通的老人了！在這樣「大人化」、「虛偽化」、「冷酷化」、「實利化」的中國內，我的文章恐難得有人注意。而在過去的敵國內，倒反而有我的知己在。這使我對於「國」的界限發生了很大的疑問。我覺得人類不該依疆土而分國，應該依趣味而分國。耶穌孔子釋迦是同國人。李白杜甫莎士比亞拜輪是同國人。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英機等是同國人……而我與吉川谷崎以及其他愛讀我的文章的人也可說都是老鄉。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上一句我承認，下一句我懷疑。如開頭所說，我相信文藝創作是盲進的（實即自然的），不期然而然的，那麼還講什麼「得失」呢？要講得失，我這些談「沒有甚麼實用的，不深奧的，瑣屑的，輕微的事物」的文章，於世何補？更那裏值得翻譯和批評？吉川君說我在海派文人中好比「鶴立雞羣。」這一比也比較得不錯。雞是可以殺來喫的，營養的，滋補的，功用很大的。而鶴呢，除了看看而外，毫無用處！倘有「養鶴焚琴」的人，定要派他實用，而想殺他來喫，他就嘎嘎長鳴，沖霄飛去，不知所至了！

三十五年四月十一日於沙坪壩

附錄讀「緣緣堂隨筆」

八三以來，藏書盡付劫火，生活困苦，購書無資，與日本刊物更之接觸之機會。日昨友人某君以谷崎新著隨筆集昨今見示，中有著者之中國文藝評，對胡適豐子愷林語堂諸氏之作品各有所論述。其中論子愷最詳，於全書百餘頁中竟佔十頁，所論尙允當，故譯之以示各地之知子愷者。余不見子愷，倏逾六年，音訊久疏，相思頗苦。子愷已由黔入川，任教以外，賴實業以自活。此異國人士之評論，或因余之遙譯有緣得見，不知作何感想也。三十二年五月，譯者在上海。

緣緣堂隨筆著者豐子愷的名，在我國差不多沒有人知道，我也還是於接到這本書的時候初聽到的。這隨筆是中國叢書中的一冊，譯者是吉川幸次郎。在譯者的話之中，有這樣的話：「我覺得著者豐子愷是現代中國最像藝術家藝術家，這並不是因為他才多藝，會彈鋼琴，作漫畫，寫隨筆的緣故，我所喜歡的，乃是他的像藝術家的真率，對於萬物的豐富的愛，和他的氣品，氣骨。如果在現代要找尋陶淵明王維那樣的人物，那麼，就是他了罷。」他在龐雜詐偽的海派文人之中，有鶴立雞羣之感。一關於這位著者的經歷，吉川氏也謂不甚詳細，祇知道他生於杭州附近的石門灣，家中上代是開染坊的。曾留學東京，歸國後在上海任音樂教師，現在隱居於故鄉，最近歸依佛法，已茹素，著述有隨筆數冊，及音樂繪畫的理論若干種而已。又在吉川氏的譯者的話中，有值得注意的一節，說

「現代中國文學之中，最可觀的是隨筆；小說戲曲，比起隨筆來都差。這從中國文學的歷史上說來，是很有興趣的事。在過去的中國文學中，可以認作散文文學的正統而最發達的是隨筆，文選裏所收的以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都是隨筆類的東西。民國的文學革命，曾反抗這個傳統，希望中國出莎士比亞，出歌德，出左拉，但結果似乎仍流入了隨筆的方向去。（中略）這尊重實際的民族，於敘述身邊雜事，是有熱心的，撞場的，可是對於小說的構成，卻不內行，非其所長。」所以「隨筆在中國文化的考察上是重要的資料，過去的隨筆如此，現在的隨筆也如此。我覺得這部書對於理解中國，不是無用的東西，至少比那些膚淺的政治論有些用些。」文選和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都可認作一種的隨筆，這判斷容可懷疑，但「中國文人長於敘述身邊雜事，不善於小說的構成。」這批評如果是對的，那麼也可包括到我們自己。吉川氏雖說「這現象乃中國民族的性癖使然，」也許東方人全體的性癖都如此呢。

二

綠綠堂隨筆，僅僅讀了譯本一百七十頁的小冊子，著者的可愛的氣稟與才能，已可窺見，足以證明吉川氏的介紹不曾欺騙讀者。如果說胡適氏的四十自述是學者的著作，那麼這本隨筆可以說是藝術家的著作。他所取的題材，原並不是甚麼有實用或深奧的東西，任何瑣屑的輕微的事物，一到他的筆端，就有一種風韻，殊不可思議。求之於現在的日本，內田百閒氏一流人差可比擬（在通曉音樂一點上亦相共通）。在這部譯本裏面，第一篇寫喫瓜子，有十五頁光景，我希望大家能一讀。因為題材是中國式，能把這種些微的題材寫得那樣有趣，正是隨筆的上乘（吉川氏的譯文也很好）。這恐怕是他最得意的一篇罷。可是著者的境地，決不侷限於這種方面，各篇都有情

味與特色。我所喜歡的是下面的山中避雨。著者帶了兩個女兒遊西湖，在山間遇雨，避雨茶肆，雨老是不止，爲想解除女兒們的厭倦，借了茶博士所拉的胡琴，拉奏各種的小曲，全篇所記祇五頁，於短篇之中，富有餘韻。我用胡琴從容地（因爲快了要拉錯）拉了種種西洋小曲，兩個女孩和著了歌唱，好像是西湖上賣唱的，引得三家村裏的人都來看。一個女孩唱著漁光曲，要我用胡琴去和她。我和著她拉，三家村裏的青年們也齊唱起來，一時把這苦雨荒山鬧得十分溫暖。（中略）我有生以來，沒有嘗過今日般的音樂的趣味。我讀了這風流的一節，不禁想到從前音樂師葛原氏乘船上京，在明石浦彈琴一夜，全浦的人皆大歡喜的故事來。著者又說，「鋼琴笨重如棺材，梵和鈴要數十百圓一具，製造雖精，世間有幾人能夠享用呢。胡琴祇要兩三角錢一把，雖然音域沒有梵和鈴之廣，也儘夠演奏尋常小曲。（中略）這樂器在我國民間很流行，剃頭店裏有之，裁縫店裏有之，江北船上有之，三家村裏有之。倘能多造幾個簡易而高尚的胡琴曲，使像漁光曲一般地流行於民間，其藝術陶冶的效果，恐比學校的音樂課廣大得多呢。我離去三家村時，村裏的青年都送我上車，表示惜別。」還有一篇叫做父親，比山中避雨長兩三頁，詩趣橫溢，非常地好。大概著者是個非常喜歡孩子的人，這二篇以外，如華瞻的日記，陪考等，都寫著兒女的事情。

三

豐子愷氏是曾在日本留學的，隨筆中時有關於日本的記憶，如記音樂研究會中所見就是。豐氏留學東京，是專修音樂，抑是別有所修而把音樂當作業餘的消遣，文中沒有說及，無從知道。又，他的留學東京的正確年代，也不明白。據其文尾附注「廿五年一月九日作」及文中「已是十五年前的舊事」，我歸國後就爲生活所迫放棄

提琴至今已十五寒暑」推之大概在民國八年與十年——大正八年與昭和元年之間。著者先借引向愚氏所作東京帝國大學生活的話記述當今的東京學生間的風氣說，「上課的時候，並沒有查堂或點名的事情，而從沒有看見學生缺課，因為他們深切地明瞭他們目前所爲的是何事。（中略）整天的工夫或半天的工夫，一雙眼睛注視在書上沒有倦容。他們這種勤學苦幹的精神，令人覺得明治維新到今日，不過幾十年，把一個國家弄到這種地步，並非偶然。一再把自己當時所觀察到的情形來加以證明，日本學生的勤學苦幹的精神，真是可以使人歎服。而我在某音樂研究會中所見醫科老學生的勤學苦幹的精神，尤可使我敬佩到不能忘卻。他的相貌和態度，他的說話和行爲，我到現在還能清楚地詳細地回憶起來。」這個老醫學生是個生來毫無音樂天分的音癡，爲了生平缺乏藝術修養，因此利用課餘的時間來這裏學習提琴。他告訴我，他將來還想到德國去，德國是音樂最發達的地方，所以他決心研究音樂。說到「決心」兩字，他的態度十分認真，把頭點一點，表示他是一個有志者。我覺得這是日本青年所特有的毅力與真率的表示，在中國是見不到的。「著者最初見這個「全然沒有音程觀念。沒有手指技巧，沒有樂譜知識」的醫學生不自量力，竟加入音樂研究會來作提琴的練習，很覺可笑，認爲是「一個可憐的無自覺的妄人。」不料這老醫學生自知才能在常人以下，比常人加工練習，結果上了軌道。「拍子和音程固然相當地正確，了拉的手法也相當地純熟了。（中略）這個可憐的不自量力的妄人，我最初曾經斷定他是永遠不能入音樂之門的，不料他的毅力的奮鬥果然幫他入了音樂之門。著者又引胡適氏敬告日本國民中的一段，「日本國民在過去六十年中的偉大成績，不但是日本民族的光榮，無疑地也是人類史上的一樁靈蹟。任何人讀日本國維新以來六十年的光榮歷史，無不感覺驚嘆興奮的。」又說，「這個靈蹟，大約是我在東京某音樂會中所

見的醫科老學生及向愚先生所述的帝大學生之類的人所合力造成的。中國人士對於我們日本人的精神力如此讚美，頗足令人惶恐，但著者並非是無條件地讚揚，他在文章末尾有這樣的一段話，「但我的所見，已是十五年前的舊事，不足爲憑了。據回愚先生所說，現在（指民國二十五年）昭和十一年，東京帝大學生的思想『萎靡不振，太令人失望了。』（中略）據說現在日本學生的思想已由『唯物史觀』轉向到『就職史觀』，『唯物史觀』不論是否，總是一種人生觀，就職史觀就是祇求有飯喫，不講人生觀了。這是何等的萎靡不振。若果如此，那種毅力和勤學苦幹的精神，今後對日本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了。民國二十五年，就是事變勃發的前一年，是抗日思想正激烈的時代。著者寫文章時多少受著當時對日誹謗的抗日宣傳的影響，也未可知。但從別一方面說，當時正是英美文化在我國燦爛的時代，確曾有這樣毛病，有隙可乘，就被中國方面指摘到了。帝都風氣的變化，傳到鄰國會如此之速。一想到此，我們不得不有戒心。以上老醫學生的話是著者的所見之一，還有所見之二。所見之二一篇中，寫著著者所從受教的一位林先生的事。——呀呀，我把綠綠堂隨筆寫得太多了，就此打住罷。我因了著者的文章知道了許多事，那時小石川旭日町電車站附近的衛堂裏曾住過一位名叫林先生的仙人樣的人。先生從音樂學校畢業後留學德國，回國以後，就在這小衛裏掛起個人教授的招牌，教授音樂，到那時已有十年。先生是獨身者，連女僕也不用，祇有那房東的老婆婆相對他照料雜務。房子祇小小的三間，平日所著的老是和服，頭髮是蓬蓬的，一年四季從朝到晚關在樓上，不出門一步。把一生都貢獻於鋼琴提琴大提琴的教授上，自己承認以音樂爲生活。原來在大正八九年間，東京小石川地方曾住過這樣一個特別的人物，我們不曾注意到，這在我很感到興味。這東洋的奇人的風貌，用著者的筆致傳出，尤覺得非常地適宜。（下略）

辭緣緣堂

走了五省，經過大小百數十個碼頭，纔知道我的故鄉石門灣，真是一個好地方。牠位在浙江北部的大平原中，杭州和嘉興的中間，而離開滬杭鐵路三十里。這三十里有小輪船可通。每天早晨從石門灣搭輪船，溯運河走兩小時，便到了滬杭鐵路上的長安車站。由此搭車，南行一小時到杭州；北行一小時到嘉興，三小時到上海。到嘉興或杭州的人，倘有餘閒與逸興，可屏除這些近代式的交通工具，而雇客船走運河。這條運河南達杭州，北通嘉興上海蘇州南京，直至河北。經過我們石門灣的時候，轉一個灣。石門灣由此得名。無數朱漆欄杆玻璃窗的客船，麇集在這灣裏，等候你去雇。你可挑選最中意的一隻。一天到嘉興，一天半到杭州，船價不過三五圓。倘有三四個人同舟，旅費並不比乘輪船火車貴。勝於乘輪船火車者有三：開船時間由你定，不像輪船火車的要你去恭候。一也。行李不必用力捆紮，用心檢點，但把被褥、枕頭、書冊、煙袋、茶壺、熱水瓶，甚至酒壺、菜櫥……往船艙裏送。船家自會給你布置在玻璃窗下的小榻及四仙桌上。你下船時彷彿走進自己的房間一樣。二也。經過碼頭，你可關照船家暫時停泊，上岸去眺矚或買物。這是輪船火車所辦不到的。三也。倘到杭州，你可在塘棲一宿，上岸買些本地名產的糖枇杷、糖佛手，再到靠河邊的小酒店裏去找一個幽靜的座位，點幾個小盆：冬筍、茭白、齊菜、毛